

(上接07版)

问:复合图书馆时代,数字文献和纸质文献,孰轻孰重?

吴志荣:21世纪以来,文献数字化和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图书馆或将面临重大变革。我用了一个词“图书馆运作体系”,它是从功能的角度对图书馆的各项日常业务工作的运作进行逻辑上的宏观归纳。图书馆运作体系的发展趋势是图书馆人较为关注的领域并应该加以研究。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可能:即在出版市场上,纸质文献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或不完全取代,由此出现不同的运作体系;如果出版市场上纸质文献没有完全被数字文献所取代,图书馆还需要采集、整理、存贮和提供纸质文献。2008年以来,数字文献增长更为迅猛,学科资源门户建设是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必然趋势。学科资源门户建设,实质上也就是高校图书馆对数字型的学科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并提供给用户。相应地,这就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和信息素养。

问:请结合贵馆实际,谈谈如何才能处理馆藏文献“藏”与“用”的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

吴志荣: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很有特色,值得深入挖掘。图书馆人首先要摸清家底,也要了解服务对象,只有技术是不行的。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上海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们结合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对古籍进行古籍图书的普查和书目数据的完善以及古籍数字化的建设,缓解了藏与用的问题,我们还发现了珍贵的古籍。图书馆有教育功能,举办文献主题展览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3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的文献主题展览,对上海高校图书馆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上海高校图书馆有个“展览联盟”就源于此。不过,办这样的主题展览,还是很有难度的,要熟悉馆藏,选题也要反复斟酌。

问:2010年,您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标准书目分析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类馆藏发展实证研究”成功立项。您在该课题中采用的“案例实证研究”影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案例实证研究”吗?

吴志荣:该课题成功立项的原因有两点:一是21世纪以来,我国纸质图书出版量剧增,而低水平重复和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影响了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质量;二是2008年开始举行的“馆藏与出版”论坛,已经对此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而该论坛就是倡导在馆藏建设领域开展“案例实证研究”。

“案例实证研究”包括两个含义,即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案例

是真实的典型事件,代表或反映着某一类型的事物、蕴含着该类事物的基本活动原理。通过案例研究,获得理性认识,建立或完善理论架构,是案例研究的价值所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收集数据,在综合客观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特定类型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应用型学科研究的基础工作。应该说,我国的馆藏建设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或宏观研究层面,所以很难解决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为此,2008年我们创办了“馆藏与出版”论坛,倡导在馆藏建设领域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以开拓馆藏研究的新局面。需要指出的是,实证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撑。当然,实证研究本身又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在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归纳出当前藏书建设的新规律,这都将进一步丰富馆藏建设的理论体系。在我国馆藏建设研究领域,微观研究比较薄弱,所以应该强化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或者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提升理论。我们认为,“案例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将把馆藏建设研究引向深入。

问:2012年,您实现了一次身份转型,即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岗位上退休后开始执掌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之后,您在治馆和治学方面依然非常出色。2015年,您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空间布局的若干思考》,探讨当代图书馆在空间布局的发展趋势,并对我国图书馆界在图书馆空间布局方面的失误进行了分析。请您就此谈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空间布局的特点和理念。

吴志荣:在我国图书馆界引入IC的概念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当代图书馆的空间布局问题,2009年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了《“藏阅分离”模式或将回归?——关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布局的思考》的文章,2015年又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空间布局的若干思考》。可以说,我已经对当代图书馆的空间布局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十分凑巧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在2014年开始准备建造一个新馆,要我提出布局方案,也就是给了我一个实践我多年来思考成果的机会。在这里,理论与实践就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图书馆建设中并不多见,即一个图书馆建筑的建设和布局完全听从一位图书馆学专家的意见。

在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该馆的建设布局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压缩纸质文献存贮空间;增加休闲空间;增加研讨室;整个图书馆要有文化氛围,尤其是大厅的布置,要与学校的办学理念相结合,这样会对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阅览座位数量和书架数量要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评估的需要;不建立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上网电脑分散放置在各借阅区内,方便读者使用等等。因此,新馆有一个800平方米的密集书库,可放置近50万册图书,省出来的面积就能建立休闲空间。所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它的密集书库和休闲空间的面积在上海高校图书馆中却是比较大的。这符合了当代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即图书馆除了完成以往需要开展的各种业务以外,还必须开展读者之间或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新馆的密集书库还利用了RFID的定位功能,使得图书得以密集存贮,大大增加了存贮空间。

问:这一时期,您在治学方面有何成果?

吴志荣: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期间,我重点在运用“案例实证研究”方法编制书目,而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时,我提出并阐述了“文献发现”这一概念及其意义。2013年,我领衔编撰出版了《中国哲学学术图书基本书目(1995—2005)》,我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发现:一个新的理念”。如何选择有价值的文献,如何指导读者利用有价值的文献,也即“文献发现”,已成为当代社会赋予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我认为,“文献发现”是当代图书馆新的社会职能和核心竞争力,因此,该理论的提出将推动馆藏建设理论和图书馆职能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团队研制出基本书目,给出了一个哲学类学术文献发现的案例。这对提高高校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问: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推出了《馆藏教育学高被引图书提要目录(1995—2005)》,您带领团队编制这册目录的原因是什么?

吴志荣:这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好案例。这本目录是在《中国哲学学术图书基本书目(1995—2005)》的基础上编制的,基本书目运用了引文分析法和二八定律,选出我国1995—2005年的高被引图书,也就是有价值的图书。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成果,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去,为此,天华学院图书馆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基于教育学是天华学院的重点学科,购买了基本书目上收录的有关教育学的高被引图书,让这些图书成为天华学院图书馆的特藏;二是编制了这些图书的提要目录,发放给天华学院教育学院的教师,起到宣传介绍的作用,以提高这些图书的利用率。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目录学、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研究密切相关,大量纸质的二次文献仍然具有提供文献线索的作用,数据库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问:复合图书馆时代,图书馆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阅览区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藏书区

服务的对象是读者,工作的对象是文献,当然这里的文献不仅有纸质文献,还有数字文献。近些年来,“资源发现”“信息发现”“知识发现”之类的提法屡见不鲜,但您习惯用“文献发现”一词,这是为什么呢?

吴志荣:近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诸多“外部反思”现象,这种现象和20世纪80年代代理下的隐患有密切关系,虽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还是脱离了我国图书馆的现实,如“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自由”“图书馆信息公平”“知识发现”“全方位的藏阅合一”等理念都来自国外图书馆界或社会上的一些强势学科。我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一定要摆脱来源于“学徒思维”的“外部反思”,才能获得自我主张。我用“文献发现”一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图书馆能够主动、及时、准确地向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献,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服务水平了。“知识发现”的提法就不靠谱了,就目前来说,图书馆根本无法向读者提供他所要的知识,因为“知识”的概念太复杂了。2015年,我发表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外部反思现象》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些问题。

这些年,受到同行的关注,我经常被邀请外出讲学,在讲座中,我总是强调这样几点:一是图书馆学要大力开展“案例实证研究”。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研究的两大主要领域。理论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特点是背景宏观、范围狭窄,要继续发展或深入研究,已非易事。就研究者而言,如果没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很难在短期内有所创新和建树。而应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则较为广泛,年轻馆员应将研究重点放在应用图书馆学领域,寻找那些和自己工作紧密相

关的问题开展研究,不要盲目跟风,片面追逐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而在开展应用图书馆学研究时应该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二是如今一些图书馆学研究活动已经偏离方向,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回归本位。最近,我与上海师范大学蔡迎春副馆长合作撰写发表了一篇文章,即《泛化和思考:从学科属性看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摆脱“学徒思维”和“外部反思”,把握好图书馆学的学科边界。

问:您如何看待复合图书馆这些年的发展?

吴志荣:这些年来,图书馆的发展大概有这样一些趋势。一是空间变革,主要就是增加交流空间。二是信息技术继续发展,除了RFID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以外,分析读者数据的相关软件的开发也引起了业界的注意,而随着数字人文理念的逐渐普及,用户将会提高对文献数据库检索效率的要求。AI技术也开始进入图书馆,一些水平较低的机器人已经出现在图书馆里,还有一些图书馆采用了智能书架。三是传统业务也在继续发展,如采访工作在文献选择方面的努力(采用PDA方式就是一种努力),编目工作在如何适应数字时代方面的努力(采用RDA同样也是一种努力),服务工作主要体现在线上线下结合,加强主动性和针对性(开展学科服务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四是图书馆联合进行机构库开发,实现数据共享,从而打破数据库供应商的垄断,可能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此外,我也注意到,当今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很重视提高自身的素质,参加专业学习和专业会议的积极性很高。

这一切都是向智能图书馆方向,并最终向智慧图书馆方向发展的基础。